

许婉媚/文

今天看完了《道林·格雷的画像》,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像坡的《威廉·威尔逊》:灵魂的镜子。

这才发觉爱伦坡虽然是象征主义大师,其思想和深意也有一定的唯美成分,艺术和生活那么的飘渺。王尔德认为生活是苦难和罪恶的,唯有艺术是美的,艺术是超然生活的,是脱离于苦难生活的一方净土。虽说一个玩了一辈子唯美的人最后被唯美给玩了,但唯美一词本就有象征主义,它象征着对生活的失望而在虚无中找到精神寄托。

我在这不是要论证王尔德受了多少爱伦坡的影响,我只是想说说这两部作品对我的触动。我们每一个人,也许做过很多的善事,也许许多的平常事,但也做过一些或大或小的对不住自己良心或道德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灵魂的镜子呢?有没有一个载体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现在的面目有多么狰狞呢?

威廉·威尔逊有他的影子,他的影子

是他正义的一方面,时时刻刻站出来提醒他、阻止他,所以他憎恶那个总是碍事的孪生兄弟式的影子。道林格雷有他的画像,尽管他把他的画像变成了他的罪恶承载体。但是他的画像却是他罪恶的镜子,那样赤裸裸的、毫不留情的昭示着他做过的一切罪恶。他于是那么的怕它,把它锁起来,不让任何人看它,却又肆无忌惮地去寻找作乐欣赏自己灵魂究竟能被扭曲到那种境界。

我想起了关于弗洛伊德的双重人格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双重人格,我们每个人也许做每一件事情时都那么的纠结:我该不该这样,我该不该做对不起他人的事情,我该不该给他或她联系,我该不该犯下这桩罪过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此时,两个我就在那里打架,直到软弱的一方败下阵来。

但不幸的是,有时候胜的那个我恰

好是软弱的那个我,我没有威廉·威尔逊那样有另一个良知的我出来告诉我这样做是可能错误的,也没有道林格雷那样有一副灵魂的镜子告诉我做错了。所以我一错再错,直到悔恨收场。

会有别人像惋惜他们那样的惋惜我们吗?原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好多人一定提起王尔德就会提到爱伦坡,我感到我找不到他们很多共同处。爱伦坡是我心目中那个永远忧郁绝望的怪才王子,而王尔德却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很幽默,很懂得对生活调侃。

爱伦坡是让人阴郁和绝望的,带有哥特风格的黑色浪漫。坡迷们读他的作品就像是在荒原上涉足。我爱他的绝望和阴郁,他平淡但是无比怪诞的叙述,隐含着的才华和激情让人震撼。同时还有他那无人匹敌的逻辑推理能力。我不喜欢柯南道尔的原因是他只是在坡画定的

那个圈子里去发扬,去登峰造极,可毕竟还是类似的作品。

而王尔德呢?他似乎一定是那个生活嘲弄他,他一定要百倍的嘲弄回去。他机智、幽默、让人喜欢倾心的成熟男人,一个不相信生活却一定要创造出那个自己的生活让别人去相信的人。他的戏剧很温暖,他的言语很犀利,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却是一个纯粹的爱情主义至上者。

王尔德说爱情通常以自欺开始,以欺人结束。

他的语言犀利得让人去痛,却无比的震撼和让人警醒。他说天长地久永远是欺骗人的,因为那份爱早就过了保质期,剩下的只是虚伪的维持罢了,所以天长地久甚至比逢场作戏还要短暂。他说当那个已经不为你所爱的人哀痛欲绝时,你感到的只是好笑。所以王尔德是一

个可以让你痴迷的男人,而爱伦坡才是一个爱人。

我痴迷于他推理小说中的冷静睿智、乌鸦中的哀伤、丽姬娅中的神秘、黑猫中的报应、红死魔面具下的冷笑。也许王尔德和爱伦坡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两个都是对生活绝望的人吧,只不过表现不同。

爱伦坡在《椭圆形的画像》这篇文章中给予我们一个凄婉迷茫的梦,在这个梦还没有醒的时候,王尔德又给这个梦刷上了一层浮士德般的颜色。关于灵魂和肉体的辩证关系,只有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幻化出一面反映我们灵魂形状的镜子来。

假如,我有这样的镜子多好,我会照出来我究竟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个我站出来告诉我怎么办,或是阻止我想干的一些事情呢?原来爱伦坡告诉我爱到深处时可以越过生死的,后来王尔德和事实告诉我,所谓的罗曼史都是骗人骗己的。一场希区柯克式的黑色悖论。理想主义没有善终的。无论观点如何不同,殊途同归。

公共外交推动中国与世界合作

吴建民/文

6月23日-27日,我陪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比利时和法国。这是我第三次陪同他们出国访问。访问时间虽短,但日程安排的很紧凑。我有三点突出的印象。

世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在上升

中国与世界交往越来越多,但总的看,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状况更不了解。

过去三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三次出国访问,官方的接待规格越来越高。2011年访问美国时,美国商务部长会见了代表团。2012年访问英国时,英国首相卡梅隆礼节性地会见了代表团,英国工贸大臣与代表团进行了会谈。而这一次,规格是最高的。在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比利时首相迪吕波先后会见了代表团。在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外长法比尤斯分别会见了代表团,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欧盟委员会主席、比利时首相和法国总统和外交部长专门会见民营企业代表团,这在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

民营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三十多年前,中国没有民营企业。而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60%,创造80%的就业机会,是中国经济生活中一支积极的、富有生气的、创新能力很强的力量。

欧洲高层领导如此重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绝非偶然。中国正在崛起,并且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正在上升。这次民营企业代表团访问欧洲所受到的待遇正是世界对中国重视程度上升的表现。

民营企业是中国公共外交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这次出访比利时和法国,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中欧关系取得了巨大进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另一方面中欧经贸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分歧和摩擦。

中欧双方围绕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一事的争论,是近期以来双方最大的贸易摩擦。企业家们在会见巴罗佐主席和欧盟委员会高层官员时,均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强调中国从事光伏产业的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征收反倾销税将会导致许多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巴罗佐主席和欧盟高级官员认真

听取了民营企业家的意见,表示欧盟方面也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打贸易战,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目前,欧洲方面正在与中国对话,希望能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

黄怒波先生向欧盟方面介绍了他去冰岛投资受阻,引起轩然大波的情况。他说:“我是一个商人,我去冰岛投资,为了使我的公司有新的发展,同时这也利于冰岛的经济发

展,创造就业机会。但是有人很害怕,把商业政治化。我不知道他们怕什么?”

今天在欧洲确实存在着一种对中国担心、忧虑乃至恐惧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还比较普遍。民营企业家们在访问欧洲期间,针对这种情绪,利用各种机会,对欧洲的政界、企业界、舆论界开展了广泛的工作。他们强调,他们来欧洲是要寻找合作的机会,实现互利共赢。因为只有互利共赢,双方的合作才能持久。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现身说法,介绍了复星集团参股地中海俱乐部的情况,确实相得益彰,双方都很满意。

这个案例是很有说服力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会见我们时,高度评价了这一案例。奥朗德在对第四届国际资本峰会的讲话中,强调这个案例很有典型意义,希望今后中法之间有更多的类似的合作项目。

在法国总统奥朗德会见代表团时,我指出:欧洲人对中国莫名其妙的恐惧。恐惧像一堵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阻碍了双方的合作。双方要共同努力,克服这种恐惧的情绪。我在接受法国欧洲电视一台著名记者夏博的采访时,也强调,恐惧中国是没有道理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大发展,我们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是合作的发展,是与世界分享我们经济增长成果的发展。夏博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不应当害怕中国。

许多中国人喜欢法国文化,希望到法国去旅游。但是,在法国袭击中国旅游者的事件在增多,治安不好,成为阻碍中国人去法国旅游的一大障碍。在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时,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在法国当大使期间,我本人就曾经遭受过袭击。

我离开法国已经十年了,但法国的治安状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更糟了。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曾经遭受过袭击。然而,两国在旅游领域合作潜力巨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境旅游的人数在上升,去年中国出境的人数高达8300万人,估计很快会突破1亿,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想来法国。”

奥朗德总统表示他十分重视中国旅游者在法国的安全问题,他已经要求有关部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中国旅游者的安全。过去卢浮宫里

的安全由保安负责,现在已经派了警察进去了,袭击旅游者

中欧经贸合作机遇很多

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依然在欧洲,法国经济再次陷入了衰退。欧洲经济面临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欧洲有困难绝不等于中欧合作没有机遇,恰恰相反,存在着大量的机遇。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基础雄厚,创新能力很强。欧洲不仅有许多优秀的大公司,而且也有大量的掌握着尖端技术的中小企业。中欧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很强,欧洲的食品工业发达,食品安全做得很好,有着许多全球知名的品牌,医疗设备和制药产业位居全球前列。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所缺少的。另一方面,欧洲由于金融危机的困扰,许多企业由于缺乏资金,处境十分困难。中方的优势主要在于资金和市场,而这又是欧洲急需的。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这次访问欧洲是有备而去的。柳传志团长一再强调,要在中欧双方互补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这个方针是十分正确的。代表团此行已经发现了一些有潜力的合作机

遇。中欧金融合作是一个有待开发、大有作为的新领域。在欧元区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欧元,欧方对此表示感谢和赞赏。法国总统奥朗德对代表团说:“巴黎愿意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场所。”中国支持欧元,欧洲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这不仅是互利的,而且符合世界走向多极的潮流。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对中国的一些担心、忧虑乃至恐惧的情绪的产生可能是必然的。消除忧虑、担心和恐惧的情绪,必定会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外交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需要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一个真实的中国是多层面的。我三次陪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出国访问的实践,使我深切的感受到,民营企业是中国公共外交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企业家谈话没有套话,直截了当地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的感受和体会,西方人比较容易听得进去,这当然会帮助他们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比利时和法国,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基本上没有负面的。这种现象在过去是不多见的。总之,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组团出国访问是一举多得的,既可以向世界说明中国,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又为企业家们的事业开拓了新的天地。这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世界的好事。

新兴国家“奇迹”不再?

鲁奇尔·夏尔马/文

在土耳其和巴西,之前日子一直过得挺顺心的中产阶级突然发动了抗议。中国的经济“战车”则面临一场信贷危机的威胁。资金纷纷逃离新兴国家的股市和债市,新兴国家的货币也遭到抛售。新兴世界的奇迹走到终点了吗?未必。眼下的局面标志着,在经历了一个有误导性的平静十年之后,新兴世界已重新走入二战之后由衰退到复苏、由政治动荡到政治安定的正常发展周期。

如果说眼下的局面比较动荡,那也只是相对于始于2003年的那段短暂的“金发姑娘”时期而言。2003年之前,新兴世界在全球经济产出中的占比不但已有半个世纪未有上升,而且还出现了十年的下滑,原因是受到了席卷泰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债务危机的拖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新兴国家纷纷换上了新一代领导人,为首的是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等人,以及包括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内的其他重要人物。

这些领导人为始于2003年的那场繁荣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此前美联储(Fed)和其他央行已大幅降息,目的在于推动世界经济走出科技泡沫破裂后的困境、实现复苏。由此产生的宽松货币大量涌入新兴市场,推动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在过去二十年间从3.6%升至7.5%左右。

那场繁荣是史无前例的。一般来说,各个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各不相同。所谓的经济发展周期,即危机引发改革、改革催生繁荣、繁荣滋生政治自满、政治自满又引爆新的危机。到2007年时,几乎每个新兴国家都处于繁荣之中——那一年,在150个新兴经济体当中,只有三个出现经济收缩,这营造出一种幻觉,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是既年轻又对生活满意的人。中产阶级将本国领导人视作英雄一样拥戴。卢拉、普京和埃尔多安都以更大的优势赢得连任竞选。

之后在2008年,美国爆发了信贷危机,更加突显了新兴国家的强势。到2009年年中,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领先发达经济体9

个百分点,这一差距创下了纪录。由于确信新兴国家已经找到永葆增长的源泉,2005年至2010年间,流入新兴市场股市的资金量增长了500%。

这一切已成为过去。目前,全球商品和资金流动正在萎缩。今年一季度,新兴国家GDP年增长率回落至3.7%,正常的周期又回来了,一些国家处于危机阶段,一些国家处于改革、繁荣或自满阶段。到了2008年,当所有的“奇迹”经济体都发展到无法维持两位数增长率的阶段时,最大的新兴国家中国却成为引人注目的例外,但它是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和信贷来保持增长的。如今,中国总债务相对GDP的比例已从2008年的150%飙升到200%以上,这加大了中国增长放缓最终会演变为增长停滞的风险。

随着中国增长放缓,那些仰仗中国大宗商品需求的经济体正受到冲击。不断下跌的价格已经伤及俄罗斯、南非和巴西等大宗商品出口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南非采矿业会爆发罢工、俄罗斯会爆发反普京抗议,而数月之后巴西又发生动乱。

一般来说,开启繁荣的领导人会变得自满、无法让繁荣的势头持续下去。无论是普京,还是卢拉及其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都没能采取足够的措施降低本国对大宗商品行业的依赖程度,而且过于仰仗政府干预来引导经济增长。土耳其和巴西的抗议者正在质问领导人,为什么要把大笔资金花在大型建设项目上,而不是花在教育以及帮助这些经济体迈入下一发展阶段所需的其

他社会基础设施上。

不过,这些负面报道所忽略的是新兴世界的其余国家。对于每一个陷入危机的国家来说,都存在一个像墨西哥这样在反垄断的总统领导下实施改革的国家、以及一个像菲律宾这样曾经拖亚洲后腿、但如今处在繁荣中的国家。

奇迹是否已到终点?提振所有新兴国家的那股“东风”已经消退。流入新兴国家的资金不断减少,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盛衰周期、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动荡。但新兴国家人口仍占世界的80%,而GDP却仅占世界的40%。因此,它们还有提升繁荣的空间。只不过不是每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这种空间。

埃及变局算不算政变

吉迪恩·拉赫曼/文

如果它看起来像一场军事政变,而且产生了政变的效果,那么它很可能确实是一场军事政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评论埃及局势的时候没有使用“政变”这个词,并不是因为他看不懂形势,而是因为,一旦美国政府宣告埃及政府被一场政变推翻,美方依法将不得不切断对埃及的援助。

在是否称其为“政变”的问题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西方困惑。西方国家政府喜欢与明确的道德范畴打交道:自由斗士与独裁者;民主派与威权派,好人与坏蛋。这使外交政策更易于理解,更易于向国内百姓解释。

在这种简单的道德宇宙里,军事政变显然是一件“坏事”,一位民选产生的总统显然是“好人”。然而,同穆斯林兄弟会的形象相比,美国和欧洲有许多人更喜欢解放广场上反对穆罕默德·穆尔西的示威者形象。

正是大批涌入解放广场的埃及世俗自由派人士在推崇西方式的价值观,如少数群体的权利和言论自由,而兄弟会想要制定一部以伊斯兰教法为蓝本的宪法。不过,令人尴尬的事实是,赢得总统大选、并在埃及议会占据最多席位的也正是兄弟会这个政党。更令人不爽的是,议会中的第二大势力集团不是自由派,而是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方面比兄弟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萨拉菲派。

西方在埃及问题上的道德困惑在中东其它地方也存在。叙利亚最初看上去像一个黑白分明的案例:一个恶毒的独裁政权与一场大规模起义,于是西方的回应是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军,并呼吁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总统。这仍是他们的政策。然而,各方对反对派的特性越来越不安。民主的自由斗士怎么会吃敌人的心脏,还被人拍下来放到视频网站YouTube上?这一切真让人费解。

一些西方评论人士开始探讨这样一个想法,即民主也许对埃及不是一个好主意。也许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推行民主制度?也许民主只会带来经济困境和社会内乱?但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政府会在公开场合表述这种想法。从阿富汗到埃及,西方将继续推动选举和民主产生的政府。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然而,埃及发生的事件令人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即西方正重返冷战时代的道德混乱。那时候,与苏联作长期斗争的那段岁月,美国及其盟友经常与军政权打得火热,因为对方似乎比别的选择更好。他们是“我方的坏蛋”。我们曾以为,苏联解体使我们解脱了这类不光彩的选择。从今后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世界各地为民主呐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毕竟,历史已经画上句号。而埃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不幸的是,复杂性、困惑和道德妥协在国际事务中是不可避免的。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